

从出土材料看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刘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曲静(北京燕山出版社)

摘 要：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学术著作《日知录》收录了一系列易学札记，涉及易卦的起源、卦爻的形与位、卦象、《周易》的编次、卦爻辞的意义、卜筮关系、易学史等问题，其中“三易”、“重卦不始于文王”、“龟从筮逆”等条反映的学术见解与现代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得出的若干重要观点不谋而和，值得重视。本文结合商周筮数材料对顾炎武的这些易学成果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顾炎武 《日知录》 商周筮数材料 周易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公元1613 - 1682）崇尚实学、知识渊博。他熟读诸经传及其注疏，并能融会贯通，在经学领域创获极多，其成就集中反映在他花费30年时间积累的读书札记《日知录》中。《易》为群经之首，故《日知录》卷一即收录顾氏研究易学的札记，涉及易卦的起源、卦爻的形与位、卦象、《周易》的编次、卦爻辞的意义、卜筮关系、易学史等问题，考证精湛、见识卓越。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顾氏在易学上的若干看法有助于解读现代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与现代学者依据出土新材料研究出的若干重要观点不谋而合，他仅通过梳理文献、诠释经传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现特选择一些出土材料对顾氏的易学见解略加分析介绍，希望能得到学界重视和指教。

一、三易

《日知录》卷一“三易”一条札记中提到“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左传》僖十五年，战于韩，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成十六年，战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而《传》不言

易”。^[1]

顾氏的意思是说，在“周易”之外，中国上古时代还有两种筮占方法及其相应的两本卦书和两套卦辞，也就是《周礼》所载大卜之官职掌的“连山”和“归藏”。后来把周易、连山、归藏合称三易，是因为周易比较有名，就以它的叫法称呼其他两种卦书了，这就像《墨子》一书把周燕齐宋的史书都称作《春秋》一样。周易的卦辞是周文王作的，但周代还有其他的卦辞，《左传》所见春秋时代的卦辞就有不见于《周易》的，更能说明直到春秋时代连山、归藏还在使用。

在顾炎武之前，已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古筮法不止周易一种，但未做论述，如晋初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说：“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2]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如李学勤先生通过分析《周礼·大卜》、《左传》中的相关文献及其历代注疏，提出三易是上古筮法的三个系统；春秋时在《周易》之外另有其他筮法，应即《连山》、《归藏》；《归藏》本为殷商筮法；《连山》、《归藏》、《周易》的重要性并无不同。^[3]古今学者依据文献得出的上述的看法，与顾氏的见解有相通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从出土商周筮数（也有学者径称其为“易卦”，或称“八卦数字”）材料来看，顾氏据《周官》大卜职、《左传》所载卦辞等文献指出中

国上古时期汉语言民族所使用的筮占方法及其占书，除周易外，还有连山、归藏等，也是基本正确的。所谓“出土筮数材料”是指商周时代石器、陶器、铜器、甲骨等器物上契刻或铸出成组数字，有三个数字一列的，也有四个、六个数字一列的。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4]首次明确指出这类数字是筮占得出的（易卦）。目前考古发现的这类商周筮数材料，经蔡运章先生最近的统计，约有200多例。^[5]这些数量不小的筮数材料，一般都可通过将其中的奇偶数字改写为阳爻、阴爻的办法转换为易卦符号，即三个数字一组的可转换为三爻的单卦（经卦），六个数字一组的可转换为六爻的重卦（或称别卦），四个数字一组的也可利用“互体卦”（即四个数字中的前三个、后三个分别转换为一个单卦，两个单卦再合为一个重卦）^[6]。现在，有的学者认为筮数既然可以转换为易卦符号，就可以直接用《周易》的卦名来称呼它们了，比如可将“六六六”（《录遗》253）转换为“䷁”称为“坤”，将“八六六五八七”（四盘磨卜骨）转换为“䷁䷂”（上坤下离）称为“明夷”，等等。但实际上，出土筮数材料的内涵较为复杂，在研究中往往不能简单地转换为周易卦名了事，因为其中可能还蕴藏着并非周易系统的筮法和卦名、卦辞。张政烺先生曾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考古所获的商周筮数材料，他把1950年在殷墟四盘磨发现的那一片卜骨上的另两条筮数分别释为“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图1），并指出若写成易卦应是䷋（上乾下坤）的“否”和䷿（上离下坎）的“未济”，其中包含的䷀乾、䷁坤、䷄离、䷁坎都是上下颠倒不变的重要单卦，它们集中出现在卜骨上不会是筮占的结果，“魁”、“隗”应是一种筮书开头的两个重卦，《魁隗》即该书的名字，如《归藏》又称《坤乾》，且文献里“神农氏”又称“魁隗氏”、“连山氏”，故四盘磨卜骨上的筮数是“连山”卦。^[7]张先生的上述看法很精到，令人信服，但由于四盘磨卜骨上的字很不清楚，也有学者对上述筮数后“曰”下的两个字有别的解释。1989年，曹定云先生作出四盘磨卜骨摹本，指出“隗”字“从由从女，并无𠂔旁”当隶定为“隗”字，“魁”字“确从鬼旁，其余笔划不清，

难于隶定”，虽然曹先生对这两个字的考释与张先生不同，但他也认为这两个字是不见于《周易》的卦名，四盘磨卜骨筮卦肯定不是《周易》，可能是《归藏》。^[8]此外，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曰”下的两字不是“魁”、“隗”，而是“凶（斯）”、“凶（斯）”四字，两辞中“凶”下的字可能相同，但很不清楚，只能确定这个字一定包含跽坐的人形。^[9]

虽然现代学者对殷墟四盘磨卜骨筮数材料的看法还不一致，但张政烺先生提出其为连山卦，仍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看法。这也说明顾炎武提出中国上古时代的筮占方法除周易外还有连山、归藏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颇有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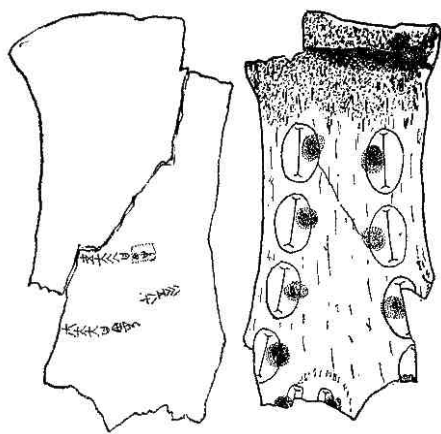


图1 四盘磨卜骨刻辞摹本（曹定云摹，《考古》1989年第7期）

二、重卦不始于文王

《日知录》卷一“重卦不始于文王”一条认为“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考之《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卦为六十四者，不始于文王矣。”^[10]

传世文献中有文王（西伯）演周易的说法，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史记·周本纪》还较详细地写到“（西伯）其囚姜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可能是一种推测，故张守节《正义》说：“《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

《十翼》也。’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另外，褚少孙补写的《史记·日者列传》也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与司马迁说法相近，384爻也就是64卦，384这个数字是重卦的总数64乘以每一重卦的爻数6而得出的。

这样看来，顾氏提出“重卦不始于文王”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观点。他的第一条证据是连山、归藏、周易这三易都有8个单卦和64个重卦，连山、归藏的64卦并非文王所发明；第二个证据是《左传》所载晋襄公祖母穆姜在引述䷵卦（艮之随）的卦辞时特别说“是于周易”，顾氏认为穆姜强调“是于周易”，说明夏商时也有此重卦。

顾氏“读书得间”，他从“是于周易”四个字中悟出重卦不始于文王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呢？

据出土筮数材料来看，重卦在商代即已存在，这一点是学者的共识。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看现已发现的筮数材料，大部分是六爻的，但也有三爻的，而且时代上商周都有。因此，当时早已存在经卦、别卦两者，这证明文王始作六十四卦之说不合史实的”。^[11]宋镇豪先生也指出，商代“筮数形式有三爻一组、四爻一组、五爻一组、六爻一组”，其中四爻、五爻、六爻一组的都是重卦。^[12]张亚初和刘雨先生更明确地指出：“（出土）材料说明，在文王之前或同时，从商王都城到边远地区都广泛流行着这种重卦的占筮方法。因此，说重卦是文王发明的，是不太可能的。重卦这种比较复杂的占筮方法，说是某个人在一时一地发明的，按常理推论也是不大可能。”^[13]

目前出土的商代筮数材料，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统计。^[14]综合前人的工作，商代筮数中的重卦主要有如下几例（图2）。

1982年春，殷墟苗圃北地殷代墓葬M80墓主人脚下出土的一件青灰色细砂岩（发掘者指出是磨石），其三面刻有筮数，可辨认的有六组，分别为“六六七六六八”、“七六六六六七”、“七六八七六七”、“六六五七六八”、“八一一一六六”、“八一一一六”。发掘简报认为，M80时代下限在殷墟三期之初，即廪辛、康丁时期。^[15]

1958年11至12月，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殷代晚期墓M9出土的一个陶罐（M9:3），其肩部有一组筮数“一八八六一一”。^[16]

1958—1959年，殷墟出土陶簋残片GT406 :6、GT409 :6上有三组筮数，GT406 :6上的是“七八六六七七”、GT409 :6上的是“六六七六八”、“六六七六五”，其时代大概是晚商。^[17]

1995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出土一件刻字卜骨（95T1J1:4），正面有三组筮数“一一六六一五”、“八八八八六六”、“九七七”。^[18]据《报告》，该骨时代属于殷墟四期。

《邺中片羽》二上·47著录一件殷墟出土陶爵范，上有“一七六七八六”和“五七六八七一”，学者一般认为其时代在殷末。

《合集》29074上有一组筮数“六七七六”，该骨现藏国家图书馆，其同版文字属于无名组，约属于廪辛、康丁时期。这组筮数虽然只有4个数字，但显然不是单卦，其第1、2、3个数字和第2、3、4个数字可各组成一单卦，从而复合成一个重卦。^[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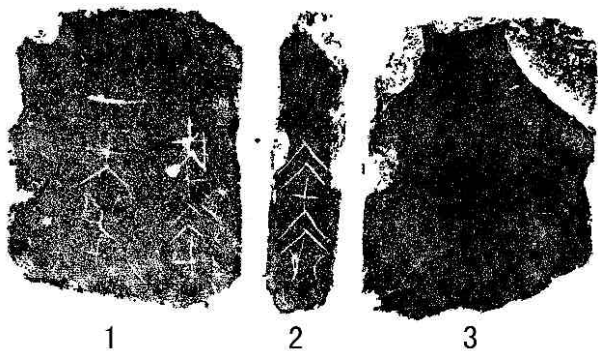


图2-1 安阳苗圃M80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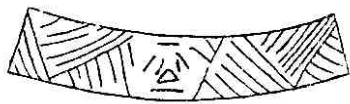


图2-2 朱家桥M9陶罐筮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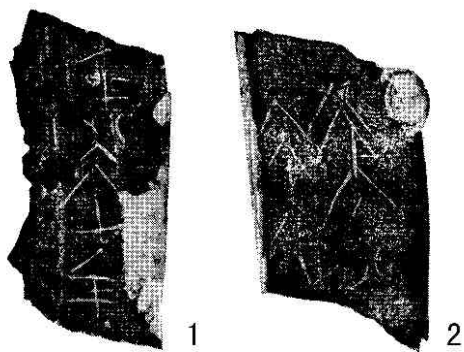


图2-3 殷墟陶簋残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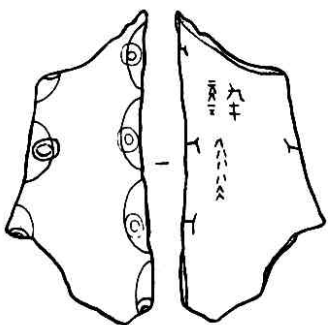


图2-4 安阳刘家庄卜骨



图2-5 《甲骨文合集》29074



图2-6-1 邲二陶爵范



图2-6-2 邲二陶爵范拓本

除上举之外，殷墟还发现过两版很重要的“重卦”筮数甲骨，但学者对其时代、性质尚有不同看法。其一即上文提到的1950年出土的四盘磨卜骨，该骨出土地层不清，伴出陶器仅有一件陶火炉发表过照片，故很难从地层学、类型学角度判断其时代，只能

据其卜骨形制、文字特点分期。目前学者基本同意四盘磨卜骨带有殷墟文化特点，如切除臼角，但对它形制与文字上的特殊之处，是属于殷人还是周人文化，学者尚在讨论。如其背面有凿无钻，两排大凿旁的灼痕向内且相向（详见图1），曹定云先生认为此种钻凿形态虽然少见，但在殷墟也有数例，应是康丁卜骨（李学勤先生指出这些卜骨上的卜辞属于无名组，其时代下限可至帝辛^[20]），他还指出四盘磨卜骨上的文字走向、字体风格虽然与西周卜骨有相似之处（即文字细小、横向直行），但总体风格是殷墟式的；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该卜骨灼痕、卜枝相向、文字纤细且横向直行与周原甲骨相像，说明它可能是殷墟出土的周人甲骨。^[21]从这些意见来看，四盘磨卜骨的时代、性质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可暂定为商末殷人之物。

另一版材料是曹定云先生1980年10月底在安阳工作站仓库内发现的一片几近完整（约存3/4）的“易卦”龟腹甲，其左前甲与左甲桥相接处、右前甲与右甲桥相接处、右后甲与甲桥相接处分别刻有“七七六六”、“六七八九六八”、“六七七七六九”等三组筮数（图3）。这版卜甲反面加工比较粗糙，甲首保留了宽厚的边缘，甲桥切割得很少并有边缘，凿为长方形，正面文字也非常细小，都与殷墟甲骨形制及文字不同，反而与西周甲骨形制与文字接近，故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出土在殷墟的周人之物。^[22]

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对有关商代重卦出土材料做了简单介绍。它们足以证明顾炎武据经籍的点滴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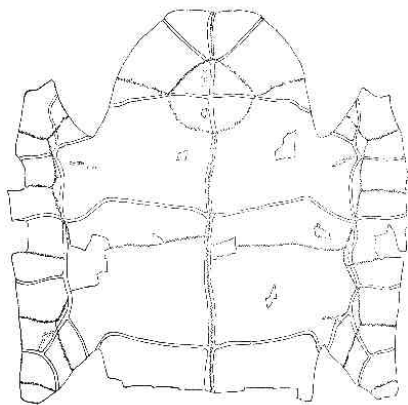


图3-1 殷墟易卦腹甲正面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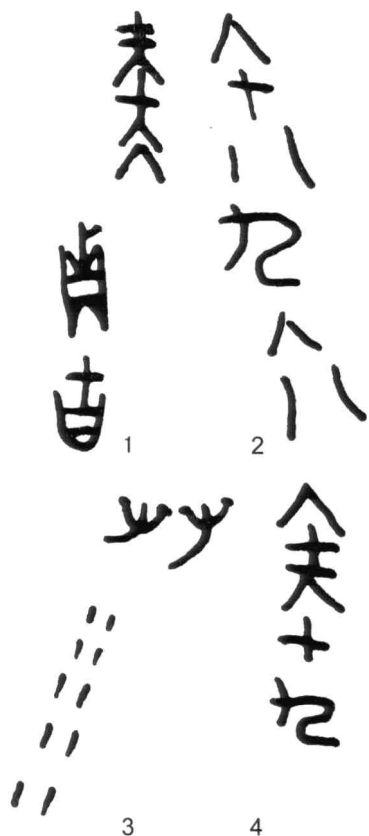


图3-2 殷墟易卦腹甲正面文字摹本



图3-3 殷墟易卦腹甲反面摹本

提出的“重卦不始于文王”是一个正确且重要的学术发现。

三、龟从筮逆

《日知录》卷二“龟从筮逆”一条说“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并用而终以龟为主。《周礼·筮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注‘当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渐也，于筮之凶，则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从筮逆’者，则知占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故《传》曰‘筮短龟长’”。^[23]

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有如下几层：一是古人为决疑而占卜时，龟卜与筮占并用，但以龟卜为主；二是《筮人》虽有“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之说，但据《尚书·洪范》“龟从筮逆”来看商周占卜未必严格遵守这个程序；据大卜职掌的三兆之法来看，龟卜程序复杂而且隆重，比筮卜更受重视，因此《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晋国卜人有“筮短龟长”的说法。

所谓“龟从筮逆”，是周武王问箕子天道时，箕子“九畴”第七畴提到的卜筮的一种情况。即王遇到“大疑”时，除了自己思考解决之道外，还要听取卿士、庶民的意见，并参考龟卜、筮占的结果，龟从筮逆是占卜的一种结果。郭沫若、李学勤先生都曾将《洪范》有关卜筮的一部分内容画成便于观览的图表，现转引于下。^[24]

序号	王	卿士	庶民	龟	筮	吉凶
一	从	从	从	从	从	大同
二	从	逆	逆	从	从	吉
三	逆	从	逆	从	从	吉
四	逆	逆	从	从	从	吉
五	从	逆	逆	从	逆	作内吉作外凶
六	从	从	从	逆	逆	用静吉用作凶

上表的第五种情况中出现龟从筮逆，预示王举行境内之事（如祭祀婚冠）吉，举行出境之事（如征伐出行）凶。^[25]卜筮的这一结果之所以受到顾炎武及其他学者的重视，是因为它与《周礼·筮人》所载的

“先筮后卜”及郑玄注“筮凶则止不卜”的制度不同。对此唐代学者贾公彦曾猜测是箕子用殷法的原故（见《筮人》贾疏），不如顾炎武的看法通达。

从出土材料看，商周时代卜筮并用的情况较为常见。殷墟发现的刻有筮数的甲骨，都是经过钻凿、烧灼的卜用甲骨，如上举四盘磨卜骨、《合集》20974、“易卦”卜甲等。陕西扶风齐家村、岐山凤雏村、长安张家坡等地发现的刻有筮数的西周甲骨也均为卜用甲骨。1980年发现的殷墟易卦卜甲上除刻有筮数外，还在一条筮数（七七六七六六）下方刻有“贞吉”一条卜辞，即为龟卜、筮占并用的证明。特别值得重视的是，2002年至2003年初周原联合考古队在扶风齐家村展开考古发掘工作时所获的一片刻字卜骨，该骨正面卜兆附近有六行37字，实为相间排列的三行卜辞与三行筮数（图4），是西周时期卜筮并用的佳例。^[26]其释文如下，卜辞内容可能与祭祀、疾病有关：^[27]

翌日甲寅，其^尚（尚？），斯[有]疔。

八七五六八七

其神，斯有疔。

八六七六八八

我既^尚（尚？）神，斯有[疔]。

八七六八六七

目前，商周时期、刻有筮数的卜用甲骨虽然发现不少，这类材料虽然是当时卜筮并用的证据，却不能说明龟卜、筮占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回答这一问题还要采用二重证据法。

从文献角度看，顾炎武认为古人占卜以龟为主，与传统上“龟重筮轻”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与《仪礼·士丧礼》郑玄注“龟重，威仪多”、贾公彦疏“筮轻，威仪少”的看法相同。从《尚书·大诰》“宁（文）王遗我大宝龟”、《诗·大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等记载来看，周人重视龟卜也确在筮占之上。从考古发现看，龟灵观念起源甚，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即出土有内盛小石子的龟壳，学者一般认为与占卜有关；到商代晚期，龟卜文化发展到高峰，殷墟发现数以万计的卜甲，据甲骨刻辞可知商王室占卜用龟多由贵族贡纳而来，经古生物学家的鉴定，有远自长江流域甚至马来

半岛的品种，其中大者腹甲达30至40厘米，尤其珍贵。殷墟出土卜甲与卜骨一样，还经过精心加工修治使之更适于钻凿烧灼。相比之下，殷墟出土的筮数材料尚不足20例，且有若干见诸平常的砺石、陶器。这很能反映商文化中龟（骨）卜之地位高于筮占。周礼因于殷礼，周人在典章制度上对殷人多有继承（这一点在西周早期更为显著）。所以周人虽然更多地使用筮占，但对龟卜仍抱有更尊崇的态度。^[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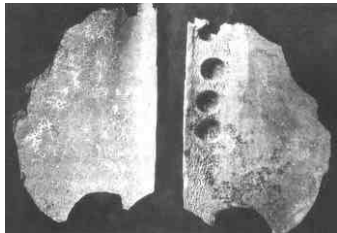


图4-1 扶风齐家村新出刻字卜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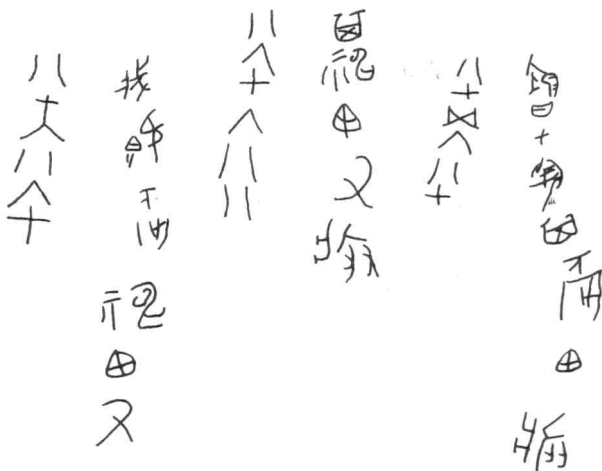


图4-2 扶风齐家村新出刻字卜骨摹本

以上主要结合考古发现的商周筮数材料简要评述顾炎武《日知录》在易学方面的几点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使治易学的专家有兴趣系统深入地研究顾氏在这一领域的成就。

注释：

- [1] [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3-85、85-86、185页。以下引《日知录》皆出自此书，不一一说明。
- [2] 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8-9页。

- [3]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2页。
- [4]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 [5] 蔡运章：《商周筮数易卦释例》，《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第131页。
- [6] 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
- [7]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蔡运章先生《商周筮数易卦释例》一文采用张先生的四盘磨卜骨刻辞释文，但认为其筮数代表的仍为周易否、未济二卦，“魁”、“隗”含义与“否”、“未济”相通。蔡文还认为《连山》、《归藏》很可能是战国人仿照《周易》编撰的易学著作。
- [8]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
- [9] 李学勤：《再谈洪洞坊堆村有字卜骨》，《文物季刊》1990年1期。
- [11]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
- [12]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97页。
- [13]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 [14]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张亚初和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蔡运章《商周筮数易卦释例》等文均统计过出土商周筮数材料。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2期）一文列有《殷代筮卦材料一览表》统计甲骨、陶器、石器上筮数材料七件16条。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下）第898页统计殷墟甲骨上筮数材料为6片13条。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第117页。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第92-93页。
-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第73至7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59》，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0至1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253页。《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发表的陶片拓本最为清晰。陶片出土的地点未见明确说明。陶片的时代，《简报》认为是“大司空村II期”，即后来的殷墟三、四期，大致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至帝乙、帝辛时代。笔者的筮数释文综合参考了张政烺先生、张亚初与刘雨先生的意见。
- [18]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 [19] 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 [20] 关于李学勤先生对无名组卜辞时代的看法，依据《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一文（《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21]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145—146页。李学勤先生指出四盘磨卜骨等殷墟筮数材料，比较集中地出土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暗示这些筮数出于从其他地区来到殷墟的周人之手。见《周易经传溯源》第147—148页。另外，张亚初、刘雨先生也主张四盘磨卜骨从字体上看属于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见《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
- [22]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曹定云：《论殷墟安阳出土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146—147页。
- [24]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6页。
- [25] “作内吉作外凶”的含义，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185—1186页。
- [26] 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 [27] 释文可参考曹玮先生文章及何琳仪与程燕《释𠄎》一文（《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𠄎字，曹文阙释，何文释为𠄎，训为灾难。疒字，原从疒从友，从友与从又（寸）同，指疾病，曹文释为瘳，认为是病愈之意。本文认为“其𠄎”与“其神”相对应，又并列为“既𠄎、神”，𠄎疑释尚，可训尊、奉，与神均有礼神之意。卜辞的意思可能是问事神后，还会有疾病吗？
- [28] 可参看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133—134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868—901页。